

时调唱歌与清末之社会启蒙运动

李秋菊*

〔摘要〕 流传于市井的时调艺术以其俚俗时行的特质,与清末启蒙思潮正相契合,因而被一些感时忧世的爱国文人所关注、重视并加以利用,成为开启民智、再造人心、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利器。启蒙者根据清末流行的时调曲调新填的曲词,已经完全跳出儿女情思、古人古事、市井俗态的窠臼,不但在题材内容、创作动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质素,不论是感慨时政、劝戒恶俗,还是破除迷信、介绍新知,无不体现出“启蒙救亡”的特色,而且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及强身—强种—强国、男女平等平权与维新图强的思想,因而老树发新芽,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掘时调艺术在清末启蒙思潮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的推进及重新评估时调之类的民间文艺的价值不无裨益。

〔关键词〕 时调唱歌;清末社会启蒙运动;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启蒙精神

清末的社会启蒙运动^①通常是指庚子国变之后、辛亥革命之前(主要指190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由各阶层人士自发推动、清政府参与的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台湾学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指出:“启蒙者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恳切而不敷衍地面对问题,并在当时局势和技术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提出各种可能的最佳答案。”^②为了开通民智与救亡图存,清末的启蒙者殚精竭虑,多方设法,凡是能想到的方式都尽可能地派上用场。而在用以开民智的众多工具中,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兴建蒙学堂、办白话报刊、成立阅报社、讲报、演说、编撰新小说、推进戏曲改良、倡导汉字改革等方式,但实际上,原本流传于市井的时调艺术亦为一些感时忧国的文人志士所利用,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主要以1900年代文人志士创作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时调曲词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的时调如何被知识分子利用而成为启蒙救亡的工具,以及在清末启蒙潮流下时调所呈现的新质素与具备的新效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华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21002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15ZDB078)的阶段成果。

①李孝悌先生称之为“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主要观点见于《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但考虑到这一运动所开导的对象是一般民众,既包括下层民众,又包括中上层民众,譬如在劝戒鸦片与缠足时,被启蒙的对象显然不全是下层民众,不少吸食鸦片者是宦家子弟、缙绅名流,不少缠足女性是名门千金、大家闺秀,故此处笔者暂且称为“社会启蒙运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亦指出:“1900年代启蒙运动的对象和影响,不仅在下层社会,还包括了其他阶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②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一、时调唱歌与清末白话报刊

出于开启民智与维新图强的迫切需求,1900年代白话报刊大量涌现出来。据专家统计,1900至1911年间出版的白话报刊至少有131种。^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清末不少白话报刊辟有“时调唱歌”、“歌谣”、“唱歌”、“小说(时调唱歌)”或“词曲”等栏目,登载“有识之士”出于启蒙救亡题旨填写的时调曲词。兹举数例列表如下:

白话报刊	时间/期数	栏目	时调篇名	作者
《绣像小说》	1903年五月初一日/第一期	时调唱歌	《爱国歌(仿时调叹五更体)》	讴歌变俗人
			《送郎君(仿时调送郎君体)》	
	1903年五月十五日/第二期	时调唱歌	《警世吴歌(仿时调十二月花名体)》	戎马书生
	1903年闰五月初一日/第三期	时调唱歌	《戒吸烟歌(仿梳妆台五更)》	天地寄庐主人
			《戒缠足歌(仿红绣鞋十二月)》	
	1903年闰五月十五日/第四期	时调唱歌	《时事曲(仿吴歌体)》	鲫士
			《从军行(仿十送郎体)》	
	1903年六月初一日/第五期	时调唱歌	《十二月太平年(北调)》	竹天农人
	1903年六月十五日/第六期	时调唱歌	《小五更(北调)》	竹天农人
	1903年七月初一日/第七期	时调唱歌	《叹中华(仿北调叹烟花)》	过江鲫士
	1903年八月十五日/第十期	时调唱歌	《破国谣·悲东三省也(仿凤阳花鼓调)》	惜秋(蓬园)
	1903年十一月/第十五期	时调唱歌	《小五更·咏日俄交战也》	竹天农人
	1903年十一月/第十六期	时调唱歌	《叹五更·悯缠足也》	天地寄庐主人
	1904年四月/第二十六期	时调唱歌	《叹国歌(五更调)》	虱穹(蛻秋)
			《自强歌》	
	1904年五月/第二十七期	时调唱歌	《同胞歌(仿四季相思调)》	伯溢
《宁波白话报》	1904年五月朔日/第一次改良第一期	歌谣	《缠足叹(十送郎调)》	
	1904年五月望日/第一次改良第二期	歌谣	《戒烟五更调》	
	1904年六月朔日/第一次改良第三期	歌谣	《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	象山王垲
《江苏白话报》	1904年八月初十/第一期	小说(时调唱歌)	《花名山歌·劝你们不要相信烧香念佛》	郢白
	1904年九月廿九/第三期	唱歌	《十个字(讲从古以来到现在的朝代,这就是历史的唱歌了)》	郢白
			《十二月节令(讲中国同外国交涉的大事情)》	
《第一晋话报》	1906年四月廿五日/第六期	词曲	《兄弟从军歌(十二月调)》	梦周
《安徽白话报》	1908年九月十一日/第一期	唱歌	《小女儿哀求放足(仿下盘棋调)》	睡狮

^①据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统计,从1900至1911年间,共出版白话报刊111种。李孝悌另外辑出这一时期出版的20种白话报刊,载于《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一文。

1900年代,下里巴人的时调艺术为什么会与文人创办的白话报刊产生关联呢?这是因为:清末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与启蒙救亡的思潮密切相关。这些白话报刊的创办宗旨主要在于开通民智,其阅读对象以一般民众为主。时调恰为普通民众所钟爱与熟稔的艺术。时调唱歌的俚俗时行与白话报刊的启蒙旨意正相契合,感时伤世的知识分子遂撷取民众烂熟于心的时调曲调,填上颇富时代气息的新鲜题材,开风气,启民智,扬善弃恶,弃旧图新,藉以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宣扬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强身—强种—强国及男女平等平权等思想,进而达到救亡图存与改良社会之终极目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①可见,《绣像小说》之所以刊载“时调唱歌”,主要因为其说书一样,“感化尤易”,是开启民智的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们发现以启蒙救亡为职责的文人据以填词的时调曲调,主要有〔十二月花名〕〔青阳扇调〕〔十杯酒调〕〔十送郎调〕〔梳妆台调〕〔太平年〕〔叹十声〕〔凤阳花鼓调〕〔红绣鞋调〕〔下盘棋调〕〔鲜花调〕〔银纽丝〕〔紫竹调〕〔童子调〕等,而这些恰是清末风靡一时、妇孺皆知的民间曲调。

二、时调唱歌之新变

1900年代文人新填的时调曲词,其创作形式是旧瓶装新酒,即采用市井流行的旧有曲调唱述最具时代气息的新题材、新观念、新世相。相对于传统时调,由于启蒙精神的注入,文人创作的曲词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质素。

(一) 题材内容之新变

时调本为流传于市井里巷的入乐俗曲,接受者常为文化素养不高的普通民众,这就决定其具有语言俚俗、内容世俗、趣味凡俗的特征。哪怕是在时调被誉为“一绝”且受到李梦阳、何景明、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卓珂月等文化名流激赏的明代中后期,其主要题材仍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冯梦龙辑集的《挂枝儿》简直就是一部“私情谱”。流传至今的清代俗曲集,如《万花小曲》《霓裳续谱》《丝弦小曲》《白雪遗音》《时调小曲丛钞》等,所收录的时调,题材仍以儿女情思、市井俗态、文学历史为主。

台湾学者林仁昱《廿世纪初中国俗曲唱述人物》指出:“原本流传于茶楼、酒馆等娱乐场所,善咏风花雪月等男女情思之事,或转唱历史故事的民间俗曲(时调),其实也在这个时代(按:林先生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即1900—1937),吸收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题材,唱起这接踵而来的诸多变化现象,或评述,或感叹,也成为可以回溯‘时代’的窗口,探索议题的媒材。”^②清末文人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创作的时调曲词,在题材上最具新意、最富时代精神,正是回溯1900年代的重要窗口、探索清末启蒙运动的重要媒材。

其一,感慨时政。清末的社会启蒙运动之所以出现,肇因于1900年的庚子国变,俄国侵占东三省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起了强化剂的作用。“对有识者而言,惨烈的历史事实和亡国灭种的可能性,就像是集体的梦魇,再怎么样也压抑不住。……消解梦魇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向人讲述这个梦魇,让更多的人历史的惨剧中洗礼、再生。”^③因而,文人创作的涉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和俄国入侵东北、日俄战争的时调曲词大量出笼。

^①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一期。

^②林仁昱:《廿世纪初中国俗曲唱述人物》,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第1页。

^③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32页。

作者或者嘲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竹天农人的《十二月太平年(北调)》批判清政府以巨额赔款换取苟延残喘,却鼠目寸光,全然不知卧薪尝胆:“四百兆赔款少不去,太平年,从此后中国刮尽地皮,年太平。……画了和约回了釜,危急存亡全不管,太平年,火烧眉毛暂顾眼前,年太平。”(出处已见前表,不再注释)《近体水调·东三省》刻画清政府奴颜婢膝将东三省的权利拱手送给俄国的丑态。《近体五更调·东三省》描绘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居然摆出一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滑稽姿态,“三更里,中立成,主人翁做了袖手人,自家事体勿敢管,倒还要立在旁边看输赢”,清政府如此昏庸腐朽,软弱无能。作者深恐庚子国变的悲剧会再次重演,“五更里,最难堪,弱国的情形实可哀,倘然勿早来变计,恐怕那八国的联兵又要来”^①,因而满怀忧虑与伤痛,谱出这首哀歌,替民众敲响一记警钟。

或者嘲讽文武官员的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今朝有酒今朝醉,忘记了八国联军来破京”(讴歌变俗人《送郎君(仿时调送郎君体)》),“正月里梅花朵朵开,外国人杀进中原来。文官只想拿个家当保,武官只怕做炮灰”(戎马书生《警世吴歌(仿时调十二月花名体)》),“众大员,费商量,颐和园召见往来忙。敝车羸马归何处,不是茶坊便是那酒坊”(蓬园《破国谣·悲东三省也(仿凤阳花鼓调)》),国家经历巨大创痛,一些文武官员不思为国分忧,积极进取,反而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哪有一点忠君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有识之士岂不感慨“做官的那里有什么清风和亮节,当兵的那里有什么义胆与忠肝?不过是大家钱儿大家赚,就只一椿上生生的送了旧江山”(虱穹《叹国歌(五更调)》)。

或者唱述民众的懵懂无知、麻木不仁。“四更里,月渐西,爱国的人儿把眉低。大声呼唤唤不醒,睡梦中的人儿著了迷”(讴歌变俗人《爱国歌(仿时调叹五更体)》),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忧心忡忡的爱国人士“大声呼唤”,普通民众却糊里糊涂,岂不心急如焚?因而开启民智的必要性突显出来。或者哀叹百姓的无辜受害,惨遭蹂躏。“外国兵来无处逃,文武百官一半儿跑,太平年,到处男哭女又嚎,年太平。……百官一去民当灾,武卫军吃粮不能打仗,太平年,反把洋兵让进来,年太平。”(竹天农人《十二月太平年(北调)》)“外国的人马进了北京,乱奸淫苦坏了众百姓。男女放悲声,家破财又倾。”(竹天农人《小五更(北调)》)“心惆怅,意傍徨,哭只哭奉天城无辜百姓,平白地一个个都收入红羊。”(虱穹《叹国歌(五更调)》)爱国人士意识到任凭风云变幻,鸡飞狗跳,百姓苦是战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

或者塑造爱国男儿的英雄形象,宣扬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梦周的《兄弟从军歌(十二月调)》唱述日俄战争爆发后,“兄弟二人”要去从军退敌,歌颂有志男儿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本色:“正月里有个正月正,兄弟二人都要当兵。哥哥说男儿只好沙场死,兄弟说不死沙场不算英雄。……十一月里朔风生,兄弟二人气象雄雄。中原只要我两个人在,不教那胡马再渡长城。”卿士的《从军行(仿十送郎体)》着力塑造一位奋勇当先、舍己为国的真男儿:“龙蛇影闪旂门下,我郎的一马要当先。……食人之禄忠人事,莫糜费这些兵马与钱粮。……马革裹尸本是寻常事,何惜的头颅吃一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满目疮痍,谁来拯救天下苍生?时调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是真男儿,就该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这类时调曲词的出现,对于唤醒国民的爱国情感自然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1900年代文人创作的关涉时政的时调,既是清末政府、官、民的“现形记”,又反映了已然觉醒的爱国文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立志救亡的社会责任感,及欲凭一己之力唤醒民众、再造人心、挽救国家、改良社会的巨大决心。

其二,劝戒缠足。缠足本是汉族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的一种陋习。虽在甲午战后,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知识分子已经痛斥缠足之恶俗,但他们关于反缠足的论述皆为文言文,尚不具备

^①《近体五更调·东三省》,收入《改良唱歌教科书》。

启蒙性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廿三日,清政府颁发劝戒缠足的谕旨(仍为文言文)。自此以后,劝戒缠足与社会启蒙发生密切关联。全国各地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会、戒缠足会、天足会、天足社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启蒙者纷纷借用白话告示、小说、戏曲、歌曲等样式,为“反缠足运动”大声呐喊。浙江象山人王垚、王升兄弟俩,约集同道,创立不缠足会。出于宣传的需要,王垚不仅与王升合撰《劝人不缠足简说十则》(登载于《宁波白话报》第一次改良第三期),详述缠足之危害与放足之必要,还据〔十二月花名〕的曲调,新撰曲词《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亦刊载于《宁波白话报》第一次改良第三期。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创作的劝戒缠足的时调,绝不停留于唱述缠足导致的皮破血烂、十指屈曲、体弱身颤等肢体上的弊病,而是将劝戒缠足与开启智识、伸张女权、保种强国的启蒙思潮相结合,突出缠足女性的自我觉醒,且将文明足与强健体魄、自食其力、保家卫国相联系,从而突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睡狮的《小女儿哀求放足(仿下盘棋调)》谓:“天足会里去签名,大家同盟换着结亲,女儿啥,我拿稳了定盘星,我拿稳了定盘星。……文明足儿顶刮刮,细能绣花粗能打杂,妈儿啥,女娃儿赛过男娃,女娃儿赛过男娃。”天地寄庐主人的《叹五更·悯缠足也》谓:“四呀四更里,月影儿向西斜,三寸红鞋困住了小奴家,不如呀,将脚来放大,帮助男儿保护国家。五呀五更里,月落到天明,奉劝同胞姊妹们听,闻说呀,立下天足会,我把这纺棉花的钱捐入在会中。”缠足女性不但智识已开,而且身体力行,要为反缠足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启蒙色彩浓厚。此类时调曲词也因“启蒙救亡”的特色而散发出新鲜的时代气息。

其三,劝戒鸦片。鸦片是清后期长期危害中国百姓的毒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鸦片的毒害是主因之一。自林则徐禁烟开始,进步人士日渐意识到鸦片的罪恶,开始呼吁禁烟,但直到1900年代,禁烟运动才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启蒙者亦纷纷借用小说、戏曲、白话告示、歌谣等样式,为“禁烟运动”做舆论宣传,这一点与清末的“反缠足运动”相类似。“缠足和鸦片是清末朝野一致攻击的恶俗。为了达到目的,各种方式都有人试过”^①,文人借用时调曲词来劝戒缠足和鸦片,就是方式之一。

天地寄庐主人的《戒吸烟歌(仿梳妆台五更)》以黑籍冤魂的现身说法唱述鸦片的巨大危害,奉劝诸君及早戒烟。《旨奉劝戒洋烟十杯酒》则是直接为1906年八月初三日光绪皇帝的禁烟谕旨做宣传的:“一杯酒,酒又甜,吃烟的人儿要过出头年。光绪皇帝忙把旨意下,各府州县禁止卖大烟。……光绪爷知道了,百姓遭鬼迷,一个个信洋人吃上了鸦片烟。若不趁早禁,将后更难言,皇上旨意下劝人戒大烟。……传地保打锣劝人早把大烟戒,晓谕众百姓才得人周全。百姓常发愤,谨遵皇上心,堪恨鸦片烟才是个害人精。若把烟戒去各病都来发,倘若不戒了辜负皇上心。……八杯酒,桂花香,戒去了大烟从此转富强。多少穷人可以忙富了,多少富人还把事业忙。从以来脱害,国富民又强,各国洋人不敢来颠狂。……奉旨戒烟人人知道,各家局子皆为戒烟忙。劝人戒大烟,终久无更改,国富民强威名镇四方。吃烟之人不敢来懈怠,戒去了鸦片烟免得乱遭殃。”^②作者反复申述光绪皇帝戒绝鸦片的旨意,显然是为了声援清末官方的戒烟运动,同时将戒吸鸦片与国富民强相联系,体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特色。总之,启蒙者创作的以鸦片为题材的时调曲词,并不局限于唱述吸食鸦片的害己害家的恶果,而是将其与弱民亡国相联系,从而具备启蒙意义。

其四,破除迷信。破除迷信是清末启蒙思潮的重要题旨之一,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小说、戏曲、曲艺的常见题材。胡适创作的章回小说《真如岛》,连载于清末白话报刊《竞业旬报》,其创作主旨就是

^①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14页。

^②《旨奉劝戒洋烟十杯酒》,收入民国初石印巾箱本《改良绘图新鲜时调地集》。

“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李伯元创作的《醒世缘弹词》亦着力宣扬破除迷信。“破迷开智”也是启蒙者创作的时调曲词的常见题旨。郢白的《花名山歌·劝你们不要相信烧香念佛》着力嘲讽烧香念佛的诸般世相：“正月里兰花开路旁，第一要紧烧年香，要保发财发福无灾祸，枯颅头磕得响。……三月里桃花朵朵红，说起子观音生日一窝风，香烛银箔烧貳子无其数，只落得西天送佛一场空。四月里蔷薇插满瓶，初八日上闹盈盈，菩萨几曾要豁浴，不过弄些铜钱养五脏神。五月里榴花照眼明，一无思想去请仙人，仙人弗到凡人做，仙方治病骗金银。六月里荷花开满河，今年病症实为多，不必吃药单送鬼，弄得纸马店里笑呵呵。……十月里芙蓉开满场，生病要去请看香，探言探语真骗子，好比银钱丢拉大西洋。十一月里山茶随路开，预修寿醮打几台。年纪大小是看人起，和尚道士补弗来。十二月里腊梅雪花飘，今年送灶火头高，天下世界有几千几万灶家佛，到要在廿四夜里一淘跑。”这支时调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十二月花名〕曲调，嘲讽烧香念佛、以迷信方式治病等行为的愚昧虚妄、自欺欺人、靡费金钱，主旨是破除迷信，开启民智。曲词虽然直白平易，但字里行间蕴藏着批判意识，颇具启蒙色彩。

其五，介绍新知。在启蒙者的眼中，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与开启民智、爱国救亡密切相关。因而，介绍新知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时调曲词的重要题材。戎马书生的《警世吴歌（仿时调十二月花名体）》讴歌工艺局、种田机器、教外文的新式学堂、铁路等新鲜事物：“五月石榴耀眼睛，做工人才到北京城。北京城里有个工艺局，到过外洋出过名。六月里荷花水面浮，种田机器真勿邱。一亩田耕起十亩止，乡下人勿必买黄牛。七月里凤仙是秋凉，十八个省分开学堂。爱皮西提人人读，过子三年五载好进翻译房。八月里桂花木樨蒸，铁路造得密层层。天下世界可以团团转，犹如插翅去飞腾。”兴办新式学堂是清末知识阶层维新图强最流行的做法之一。《近体十杯酒·劝学》唱述的教育体制，即是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其教授的内容亦具新内容、新特色：“三杯酒儿，舆地又上班，非亚欧美寒热带，大水与高山，暖暖吓，大水与高山。……五杯酒儿，最要是方言，念六字母牢牢记，爱皮与西地，暖暖吓，爱皮与西地。片音吓平音，五十之个字，亚意阿哀须记取，空时译译书，暖暖吓，空时译译书。六杯酒儿，化学要留心，弗气绿气淡养轻，试验更分明，暖暖吓，试验更分明。无机吓有机，考察须精明，声光水电渐渐进，废物成有用，暖暖吓，废物成有用。七杯酒儿，政法莫旷课，英国立宪美共和，专制是中俄，暖暖吓，专制是中俄。强权吓世界，公理都丧尽，治外法权最痛心，异族竟横行，暖暖吓，异族竟横行。……九杯酒儿，体操操得齐，朝朝暮暮勤习练，保你身强健，暖暖吓，保你身强健。兵式吓体操，更加是要紧，步伐要齐枪要整，尚武有精神，暖暖吓，尚武有精神。”^①

爱国文人注重以时调为工具来介绍新知，反映了在近代西风东渐的潮流下，进步人士得风气之先，先接触到新事物、新观念，并欲将其用之于维新图强、改造社会的“大道”，而要达成目的，先须开启民智，于是将其以时调唱述出来。

综上所述，在清末启蒙思潮的语境中，传统的时调艺术在题材方面体现出崭新的特色。文人志士创作的时调曲词在内容上已经完全跳出男女之情、古人古事、市井俗态的窠臼，不论是感慨时政、劝戒恶俗，还是破除迷信、介绍新知，无不体现出“启蒙救亡”的时代精神。

（二）曲词作者之新变

传统的时调曲词，其作者通常是未知姓氏的。明清民国的众多时调集，如《挂枝儿》《万花小曲》《霓裳续谱》《丝弦小曲》《白雪遗音》《名曲家作时调大王》《得意杰作时调新曲》《最新编制时调大观》《时调新曲》《（最新）时调大观》《袖珍最新时调指南》《最新袖珍时调大成》等，所收录的几乎皆是

^①《近体十杯酒·劝学》，收入《改良唱歌教科书》。

无名氏的作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作者的身份通常为民间艺人、风尘女子等下层民众。《镇江市志》记载:“清光绪年间,镇江人民焚毁英国领事馆后,卖唱人小毛儿编了火烧洋楼小唱,广泛流传,直到如今。”^①小毛儿就是一个卖唱的民间艺人,其所创作的《火烧洋楼小唱》即为时调。秦楼楚馆是时调的重要传播场所。风尘女子常欲借助弹唱时调来吸引热客,从而提升职业魅力。因而,妓女自编时调成为常见的现象。《五更里金翠仙自叹》是名妓金翠仙据〔梳妆台调〕填写的曲词。《烟花女子叹十声》《二十四枝花》《刺花女子自叹(十杯酒调)》《妓女十叹空》等,亦为妓女自创的时调曲词。

清末以启蒙救亡为题旨的时调曲词,其作者虽然通常署上的是化名,但其身份无疑皆是悯时忧国的文人志士,其文化素养颇高,亦具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这不能不说是时调艺术发展史上一种可惊可喜的现象。

《绣像小说》第一期登载的《爱国歌(仿时调叹五更体)》与《送郎君(仿时调送郎君体)》,皆署为“讴歌变俗人著”。讴歌变俗人是李伯元的笔名。李伯元不仅是《绣像小说》的主编,还是《官场现形记》《醒世缘弹词》《文明小史》《活地狱》《经国美谈新戏》等多种作品的作者。

《绣像小说》第三期登载的《戒吸烟歌(仿梳妆台五更)》和《戒缠足歌(仿红绣鞋十二月)》、第十六期登载的《叹五更·悯缠足也》,皆署为“天地寄庐主人倚声”;第五期登载的《十二月太平年(北调)》、第六期登载的《小五更(北调)》、第十五期登载的《小五更·咏日俄交战也》,皆署为“竹天农人倚声”。天地寄庐主人、竹天农人皆是京剧大师汪笑侬的笔名。汪笑侬生活中放浪形骸,常以李白自况,题其居处为“天地寄庐”。“竹天农人”是“笑侬”二字的拆字格。汪笑侬学识渊博,才华出众,22岁中举,但无意仕途,隐于梨园,积极推进戏曲改良,编演了《哭祖庙》《骂王朗》《骂阎罗》等多种借古讽今的剧本。

《绣像小说》第四期登载的《时事曲(仿吴歌体)》与《从军行(仿十送郎体)》,皆署为“鲫士倚声”,第七期登载的《叹中华(仿北调叹烟花)》,署为“过江鲫士倚声”,第十期登载的《破国谣·悲东三省也(仿凤阳花鼓调)》,目录页署为“惜秋填词”,正文前署为“蓬园倚声”。鲫士、过江鲫士、惜秋、蓬园皆为欧阳巨源的笔名。欧阳巨源深受李伯元的赏识,是《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的主要撰稿人,著有《负曝闲谈》《维新梦传奇》《新上海传奇》等作品。

《宁波白话报》第一次改良第三期登载的《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作者是宁波象山人王圻。《绣像小说》第二期登载的《警世吴歌·仿时调十二月花名体》,署为“戎马书生倚声”;第二十六期登载的《叹国歌(五更调)》,署为“虱穹倚声”,登载的《自强歌》,目录页署为“虱穹倚声”,正文前署为“蛻秋倚声”;第二十七期登载的《同胞歌(仿四季相思调)》,目录页署为“蛻秋倚声”,正文前署为“伯溢倚声”。《第一晋话报》第六期登载的《兄弟从军歌(十二月调)》,作者署名“梦周”。《江苏白话报》第一期登载的《花名山歌(劝你们不要相信烧香念佛)》,作者署名“郢白”。《安徽白话报》第一期登载的《小女儿哀求放足(仿下盘棋调)》,作者署名“睡狮”。虽然目前我们尚未考证出戎马书生、虱穹(蛻秋、伯溢)、梦周、郢白、睡狮的真名实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李伯元、汪笑侬、欧阳巨源、王圻一样,皆是清末具有爱国情怀和启蒙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

这就说明,在1900年代,时调以其俚俗时行的特质,与社会启蒙思潮正相吻合,因而被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所关注、重视并加以利用,成为开启民智的利器。时调一体虽俗虽微,如果利用得当,也能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在时调艺术的园地中,只要用心耕耘,亦能收获光鲜夺目的累累硕果。这对于从事民间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激励!

^①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江市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20页。

（三）创作动机之新变

传统意义上的时调曲词,其创作的主要动机是娱乐消闲与普泛意义上的道德教化。《新编过关调十样景十叹》:“十叹已经叹完成,空来唱唱解解闷,十样景看见勦动气,区区也是瞎热昏。”^①《三等凤阳花鼓》:“说劝人,话劝人,劝人总要行好心,有钱不可笑穷人,好比南海去斋僧,大的事体化灰尘,小个所在莫争论,宽宏量大不虚文,明中不晓暗知音。三等花鼓劝世人,武林书店买一本,法币则需五元零,买子转来解解闷。”^②《刺花女自叹五更调》:“五更叹罢苦修行,再唱几句劝世文。……古语说得好:酒食朋友朝朝有,患难之中无半人。劝君买本教子孙,总要学做正经人。此书乃是小热昏,到是一本劝世文。”^③诸如此类的唱词数量甚夥。可见,时调的编唱者通常具有鲜明的娱人或教化动机,并欲借“寓教于乐”的形式来吸引听众,增强时调的生机。

清末忧时爱国的知识分子创作时调曲词,主要出于社会启蒙与救亡图存的需要。作者通常在曲词中表明开化风气、唤醒国民意识的动机。如戎马书生的《警世吴歌(仿时调十二月花名体)》:“十二月里蜡梅香喷喷,自家难保自家身。开化事体勿会做,唱只山歌劝别人。”王垠《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十二月腊梅香喷喷,放脚好处话勿尽。象山风气还未开,唱只山歌劝人听。”《十二月节令(讲中国同外国交涉的大事情)》:“我唱山歌弗算啥精,唱来要劝众人听。有人听得能争气,弗枉中原来做人。”李伯元在《活地狱》中感慨:“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④他创作的“时调唱歌”,如同其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启蒙救亡的特质,流露出满腔的爱国热忱。《爱国歌(仿时调叹五更体)》和《送郎君(仿时调送郎君体)》登载于《绣像小说》第一期时,署名为“讴歌变俗人”,就是突显其弃旧图新、启蒙醒世的创作动机的用心良苦之举。

可见,清末文人志士创作时调曲词的主要意图,不是普泛意义上的娱乐或教化,而是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讴歌变俗,传播新知识、新观念,唤醒国民意识与民族情感,从而最终起到救亡图存、保种强国的效用。因而,这类时调曲词的创作与登载是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文化宣传活动,既是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的工具,又是其产物。

三、时调唱歌所体现的启蒙精神

李孝悌先生精辟指出:“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使得‘开民智’的主张一下子变成知识分子的新论域,‘开民智’三个字也一下子变成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其普遍的程度绝不亚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一般‘有识之士’或所谓的‘志士’,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筹谋对策,并且剑及履及,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⑤需要补充的是,传统的时调艺术亦为有识之士所利用,成为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志士创作的时调曲词,体现出颇具时代气息的启蒙精神。

一是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甲午惨败、庚子国变、俄国强占东三省、日俄战争……,中华大地惨遭接二连三的灾祸,但放眼望去,官民同醉,启蒙志士深感国危民困,必须担负起救亡的责任。而要救亡,先须启蒙,在清末这一特殊时期,启蒙与救亡紧密相联。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子创作的关及时政的时调,往往出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目的,因此既具醒世醒群的特质,又充溢着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与浓

①严一臻编辑,林一鹤校正:《时调大观四集》,第六叶。

②《最新袖珍时调大成》,民国后期上海印行,平装巾箱本,第24页。

③大美书局编著:《时调新曲》,大美书局出版,上海沈鹤记书局发行,1941年二月6版,第113页。

④李伯元:《活地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⑤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5—16页。

厚的爱国情感。

李伯元的《爱国歌(仿时调叹五更体)》唱道:“一更里,月初升,爱国的人儿心内明。锦绣江山须保稳,怕的是人家要瓜分。二更里,月轮高,爱国的人儿胆气豪。从今结下大团体,四万万人儿是同胞。三更里,月中央,爱国的人儿把眉扬。为牛为马都不愿,一心心只想那中国强。四更里,月渐西,爱国的人儿把眉低。大声呼唤唤不醒,睡梦中的人儿著了迷。五更里,月已残,爱国的人儿不肯眠。胸前多少血和泪,心里头一似滚油煎。”“爱国的人儿”作为时代的觉醒者,看到了国家惨遭瓜分的危机,大声呼吁国民要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但又苦于民众仍在“睡梦中”,“大声呼唤唤不醒”,于是心急如焚。这正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

伯溢的《同胞歌(仿四季相思调)》中一个欲挽狂澜的“有志男儿”,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发出声声哀叹与呼号:“怕只怕黄种难把性命延,我的同胞呀,这几日教人懒把青山看。……恨不得手挽银河洗机关,我的同胞呀,速醒四千余年梦一场。……子细思量防备计为高,我的同胞呀,不见那俄兵未去法兵到。……风儿飘飘带着恨气来,雨儿潇潇触动国殇哀,我的同胞呀,看将来总要即时早安排。”作者企图唤醒沉醒同胞的国民意识和爱国情感,利用时调浅白通俗的特征,拉近“我”(知识分子)与同胞(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匠心独运。

清末文人创作的时调中,以启蒙、爱国、救亡为主旨的曲词比比皆是,比如“街坊舍命争,主人心不惊,昏昏沉沉睡亦睡不醒,祸临头那时才认了命,祸临头那时才认了命。……我黄种兵威杀气高,中国人为什么不要好,中国人为什么不要好?两国把兵交,中立莫逍遥,强占我疆土,愤气怎能消?快齐心大家把国保,快齐心大家把国保”(竹天农人《小五更·咏日俄交战也》),“五更五点月影消,四万同胞,亦呀呀得吟,热血如潮。国民担子勿轻抛,要把牢,到后来,总有翻梢,亦呀呀得吟,做个英豪”(卿士《时事曲(仿吴歌体)》),“五更五点月正西,勿要怕俚,摇摇得吟,啥个希奇,只要大家肯争气。冒冒险,替国家,做点事体,摇摇得吟,夺还地皮。”^①无不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感。

简言之,将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传输给民智未开的普通民众,是清末这一特殊时期文人志士最迫切、最艰巨的任务。许多文人投身其中,绞尽脑汁,苦心思索,寻找启蒙救亡的各种途径。时调艺术即是一径。文人志士创作的时调曲词,因满载着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而绽放异采。通俗浅易的时调一体也因这浓厚的爱国精神而产生新变。

二是强身—强种—强国的思想。在清末启蒙思潮中,一些进步人士已经意识到强身、强种、强国三者之间的息息相关,并要将这种意识通过各种启蒙形式传输给普通民众。在他们看来,只有国民体魄强健,民族才能强大,国家才能强盛。女子由来已久的缠足习俗,到了清末倍受攻击,且涂抹上启蒙的色彩,究其原因,绝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恶俗”,而主要因为它与强身—强种—强国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为响应清廷劝戒缠足谕旨而写的白话文告就详细推论了弱体、弱种、弱国之间的关系:女子若缠足,全国男子的身体就会日益软弱,国家也就日渐积弱。人的体质的强弱,全看父母的体质如何。中国当父亲的因成亲太早而体气不足;当母亲的因缠足而体质不好,故生下的儿子(国民)个个单弱。由于国民个个单弱,所以外国敢来欺负。要想使中国强盛起来,必先使百姓强壮起来;要想使百姓强壮起来,必先使生养百姓的母亲(现在的女儿)强壮起来。如此看来,女人的一双脚不只关乎到女子个人的命运,更关系到种族和国家的存续与富强。

鸦片也是弱民—弱种—弱国的罪魁祸首。在清末启蒙思潮的语境中,文人创作关于缠足与鸦片的时调,除了细数裹脚、吸烟的弊病,还要以劝戒缠足或鸦片为契机,宣扬强身—强种—强国的思想。《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谓:“八月桂花香竟浓,长年出血又流脓。生男育女种勿强,强盗

^①《近体水调·东三省》,收入《改良唱歌教科书》。

火种走勿动。”《戒缠足歌（仿红绣鞋十二月）》谓：“七双红绣鞋，嗳呀！七月里牵牛花儿开，嗳呀呀！反乱临头跑也跑不上来，哼嗳呀！白送命呀，我的那个小乖乖。……九双红绣鞋，嗳呀！九月里菊花儿开，嗳呀呀！潘妃步步上了金莲台，哼嗳呀！亡国货呀，我的那个小乖乖。”批判女性裹脚导致“生男育女种勿强”，形成缠足一弱体一弱种的恶性循环，终至亡身亡国，这正是清末启蒙救亡思潮的主调之一，与小说、戏曲、演说等其他启蒙形式弹唱的旋律相一致。

三是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裹脚陋俗本是为了满足男性畸形的审美趣味而出现的一种摧残女性肢体的恶习。在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活命的封建时代，它已经内化为女性自愿遵守的信条。人们并未将女性缠足与男女不平等直接建立联系。但到了启蒙志士的时调曲词中，女性缠足反映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反映了封建男性摧残女性的男权意识，因此作者要替女性“言说”，要为女性争取各种权益。

睡狮的《小女儿哀求放足（仿下盘棋调）》以母女二人（皆为缠足女性）对唱的形式，集中批判女性缠足所体现的男权意识：“小女儿裹足泪汩汩，低声娇气叫了一声妈，妈儿啥，你活将儿害杀，你活将儿害杀。……人人都是娘身上肉，为甚么男不裹足女儿裹足，妈儿啥，好肉裹成烂肉，好肉裹成烂肉。……听罢我儿这翻话，不由为娘泪纷纷，女儿啥，非怪你娘狠心，……世间男子把孽作，不好细腰便好细脚，女儿啥，风俗实在的恶，风俗实在的恶。”王垲的《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有感于缠足女性所受到的受教育权被剥夺的遭遇，要求女性不但不要缠足，还应与男性一样上学堂：“三月桃花开满树，女儿生长七八岁。哥哥弟弟都上学，只有奴奴脚绕住。……十月芙蓉开得迟，如今女人要读书。学堂一立风气开，才郎总配好女子。”天地庐主人的《戒缠足歌（仿红绣鞋十二月）》认为天足（不缠足）就是伸张女权：“十一双红绣鞋，嗳呀！十一月里茶花儿开，嗳呀呀！西洋天足好不爽快，哼嗳呀！女权伸呀，我的那个小乖乖。”由劝戒缠足等陋俗而推演到伸张女权，这正是清末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将“西洋天足”之利作为革除缠足之弊的一种理由，说明在近代西学东渐与清末启蒙救亡的思潮中，明清萌发生长的男女平等思想又成长了一大截，且提升到一个新境界。进步文人借助各种渠道（包括时调曲词）为女性的权益“言说”，是清末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

四是弃旧图新的革新思想。在清末这一新旧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一批具有新理想、新视野、新智识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他们欣然接纳各种新事物、新观念，并将其与启蒙救亡相联系，立志宣扬维新改良、自强图存之道。这从时调曲词中亦能找到证据。《叹中华（仿北调叹烟花）》提倡种田的、做工的、生意人都要维新，推崇新法，以为有了新法，就能救国于被瓜分的边缘：“种田的，怕完粮，差人一到无处可躲藏。何不讲究弄些肥田料，一秋两熟米谷成仓。做工的，是粗人，赚些铜钱好不苦辛。只要机器一部代他的手，声名洋溢日日进黄金。生意人，爱便宜，同行嫉妒处处把人欺。奉劝大众喝杯齐心酒，贬价招徕其实太调皮。豪杰士，叹中华，从今新法有了萌芽。栽培方法慢慢儿的想，不怕各国要分瓜。”《近体童子调·醒世》要大家支持维新党的工作：“十二月蜡梅花儿黄，挽回时势第一章，来了一班维新党，赶紧办学堂，嗳兄弟吓，大家都要帮点忙。”^①《近体四季想思·时事》将拯救国家的希望寄予具有新智识、新视域的青少年，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思想相一致：“冬季里想思雨雪飞，二十呀世纪风会移，尽披靡，我友呀大局共支持，出洋到日本，留学往泰西，可怜吾千钧一发相维系。君不见少年做成意大利，到如今五洲呀处处扬国旗，吾的友呀，你是黄帝的孙，还须争点黄帝气，你是中国的人，还须做点中国事。”^②

要之，质朴俚俗的时调艺术发展到清末，因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参与创作，遂由通常意义上的娱乐教化的工具蜕变为开通民智与救亡图存的利器，绽放出别样的风采。文人志士将国民

①《近体童子调·醒世》，收入《改良唱歌教科书》。

②《近体四季想思·时事》，收入《改良唱歌教科书》。

意识、民族情感、爱国精神与强身保种、男女平等平权等思想注入时调曲词中,意欲借助其俚俗时行的特质而达成创作动机,完成启蒙救亡、维新图强的终极任务,这既是清末启蒙思潮中的一抹亮景,又在客观上促成时调地位的提提高。传统的时调艺术,因启蒙精神的注入而产生蜕变,提升了品味,发挥出新效用。

结语

清末热心启蒙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李伯元、汪笑侬、欧阳巨源、王垚、戎马书生、虱穹、梦周、郢白、睡狮等),以市井流行的时调曲调、以通俗浅显的直白语言、以颇具时代气息的新鲜题材创作而成的时调曲词,或刊发于各种白话报刊,或由书局结集出版,不仅能以文本的形式供识字者阅读(文字启蒙),还可以唱本的形式供民间艺人歌唱,进而对“不识之无者”亦能起到开智作用(口语启蒙)。时调唱歌虽为下里巴人的艺术样式,但在清末这一时局艰危、民智未开的特殊时期,为弃旧图新、力挽狂澜的启蒙志士所利用,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及强身—强种—强国与男女平等平权等思想,因而老树发新芽,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探讨时调艺术在清末启蒙救亡语境中所呈现的新质素与发挥的新效用,对于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的推进及重新评估时调之类的民间文艺的价值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高峰)

Shi Diao and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Qiu-ju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popularity, *Shi diao* 时调 (popular tune) was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us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who employed this type of popular musical and literary genre to awaken Chinese people to their patriotic mission of saving their nation from outside bullying and invasion through mental and social reform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themes (e.g. love stories and legends) associated with this genre, *Shi diao* thus created acquired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pursuing social enlightenment and reforms, which were intended to eliminate superstitions and backward customs and traditions, introduce new knowledge, enhance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 and even achieve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se patriotic themes made *Shi diao*, the old type of music and literary gen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value of the folk arts and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Shi diao*; soci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national salvation; enlightenment spirit